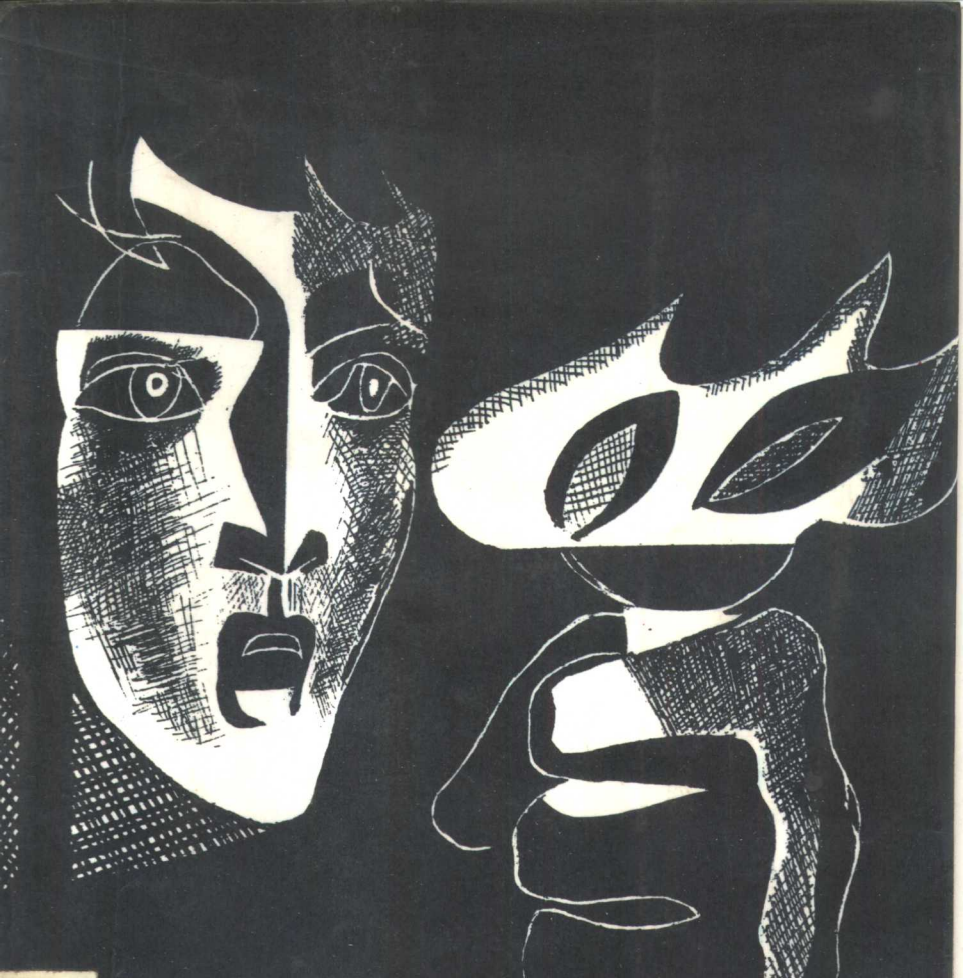

台北，台北！

台湾　王拓

（上）

2 034 4775 1

台北，台北！

（上）

台湾　王拓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6 · 北京

2 034 4776 0

台北，台北！

（下）

台湾　王拓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6 · 北京

责任编辑：宜　言
装帧设计：庞秋阳

台北，台北！（上，下册）　台湾　王拓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 25 · 520,000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309·149　定价：5.10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作者王拓先生是我们熟悉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家，1944年生于台湾基隆，原名王绂久，笔名李绌。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后获得政治大学中文研究硕士学位。七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多以家乡渔村为背景，反映殖民经济给农村带来的灾难，暴露台湾社会的黑暗面。后又逐渐转向描写城市工人和资产阶级的生活。他的主要作品有《吊人树》、《炸》、《金水婶》、《一个年轻的乡下医生》、《民众的眼睛》、《望君早归》和《妹妹，你在哪里》等等。1979年12月，因"高雄事件"王拓先生被捕入狱，直至1984年9月获释。在狱中，他写下了《牛肚港的故事》和《台北，台北！》两部长篇小说，出狱后才获机会发表，而《牛肚港的故事》已被台湾当局查禁。

《台北，台北！》一书，是王拓先生计划要写反映七十年代台湾社会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书中描写了1971年台湾"保钓"爱国运动中，台北青年学生和工人激荡的思想和行动，同时通过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对爱情、人生的追求，反映了台湾青年一代的彷徨、觉醒及对祖国统一的认识，从中也深刻地暴露了台湾现实存在的种种问题。

此书是海外华人作家直接交给我公司出版的，我们希望这部书在大陆出版，能对广大读者了解台湾社会，研究台湾问题有所裨益。

1986年1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含泪播种，必能欢呼收割！
——“台北，台北！”自序

1971年是国民党政府自从1949年撤离大陆到台湾来之后，极具关键性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里，国际上连续发生了几件大事，不但使国民党在当时感到严重的生存危机，也深刻地影响了台湾后来的发展。那几件大事依序是钓鱼台事件、美国总统的顾问基辛格访问中国大陆，以及在中共进入联合国的同时，台湾也宣布退出这个国际组织。由于钓鱼台事件的刺激，首先使旅居海外的中国人爆发了一次空前热烈的反日反美的民族运动，这种民族主义的热情，很快地感染了在台湾的知识青年，于是，在台湾的大学校园里也立刻展开了一次热烈的“保卫钓鱼台运动”。虽然这个运动由始至终都在国民党当时的保守派与革新派内斗的夹缝中才得以生存发展，同时又在国民党情治单位严密的监视下，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甚至在某一程度上还被国民党内的某些人利用为党内夺权斗争的工具而不自知。但是，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使我们的政治思想和人生态度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接踵而来的基辛格访问中国大陆，是第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外交上从未有过的大事，预示了美国对华政策与世界战略的大转变，使一向依附美国才能维持生存的国民党政府感到生存上极大的威胁。而退出联合国更显示了台湾在国际舞台上

日渐没落的窘境，以及日益孤立所带来的灭亡危机。这两件大事，一方面是使在保钓运动中滋长出来的民族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另一方面也使大多数人觉悟到政治腐败乃是外交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而开始把运动的方向由外转向内部，因此而产生了极强的本土意识和社会意识，而有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的呼声，以及知识青年上山下海深入民间，关心农民与工人等等的运动产生。我和我的许多朋友便是在这一连串的事件和运动的冲击和教育下长大的。

由于我们的上一代对"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政治恐怖还记忆犹新，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台湾将近三十年有计划的控制和诱导下，也使这一代人普遍对国家和社会的事情怀有严重的恐惧症和冷漠感，对于能决定人们生死祸福的政治，更是普遍地感到无力和认命的态度。但是，由保钓运动到退出联合国这一连串事件的冲击却激发了青年们的热情和潜能，使他们敢于把头伸到书房和学校的围墙外面，去关心政治和社会。我后来之所以能在文学上突破纯艺术和纯学术的思想，而把一些社会的现象写成小说；在1978年甚至公然以党外人士的身分去从事选举运动，都已在一九七一年所发生的这一连串事件里种下了远因。我自那时起，已有了强烈的民主政治的理想和社会改革的意愿。而这些也正是我所以选择这段时间的台湾社会与青年学生和工人作为这部小说的题材的主要原因。

1979年12月10日，台湾党外人士所创办的美丽岛杂志社为了庆祝国际人权日，在高雄市举办群众演讲会，不幸而发生了一场军警与民众的重大冲突，第三天(12月13日)

清晨，我即和林义雄、姚嘉文、张俊宏、吕秀莲、陈菊等人，在第一批黑名单中同时以涉嫌叛乱的罪名被逮捕。经过五十五天的严酷侦讯，我经历了人世间从未有过的痛苦和折磨。之后，我被判刑六年，关在桃园的龟山监狱，一直到1984年9月5日才获释，坐牢时间长达四年八个月又二十三天。

坐牢虽然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监狱的铁窗和围墙只能折磨人的肉体，却无法征服人的思想和灵魂。坐牢期间，我虽然也遭受到许多虐待和侮辱，精神上也因为想念母亲、妻儿和朋友而感到极大的痛苦。但是，这些痛苦却能使我更冷静地去省视人性的问题，也使我有更充分的时间去阅读伟大的经典之作而拓宽了思想的领域，同时也使我能更从容地去反刍过去的经验和思考未来的问题。因此，这一次的牢狱之灾对我个人来说，所得到的反而比失去的更多。这不仅是我当初被捕时始料所不及，恐怕连逮捕我而欲陷我于万劫不复的那些人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吧?!

这部长达五十几万字的小说《台北，台北!》便是我在牢狱中思考反省的成绩之一，也是我在这段牢狱生活中所写的第二个长篇。远在1972年，这个故事就已经在我的脑海里酝酿了。1979年的春天，当第三次中央民意代表增选因美国与中共建交而宣布停选后不久，我就曾下定决心要着手写这部小说了，但是写了十几万字后，我却发现自己对小说人物的思想感情，以及他们所处的世界的了解都还不够深入，对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也还不能明确地掌握，所以就放弃了，那年的12月13日我就因为“高雄事件”被捕了。现在平心静气回想，如果没有这次的牢狱之灾，我这一生

恐怕是不可能写出这部小说来的，不仅是因为坐牢有比较充分的时间而已，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次的苦难，我就不可能对人性、政治、社会和历史有现在这样的理解，也不可能对人生有现在这种比较宽容豁达的态度，因此，也就不可能象现在这么客观地、忠实地来反映我所知悉的这一切。而其中的某些情节，更是在只有坐牢之后才能更具体地被我所了解和掌握。但是，由于个人经验和才华的限制，我虽然尽了极大的努力，却不敢说我已在这部小说里写尽了人性的隐微与复杂，也不敢说我已完整地描绘了七十年代初期的台湾社会。但是，我却敢说，我在这部小说里所写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实的，同时，我也是以写历史的严肃的心情和态度来写这部小说的。但是，以我的标准来说，这仍然是一部小说而不是历史著作，因为这里所写到的每一件事，在真正发生时并不一定都象小说里所呈现的那样具有因果关系和前后连贯，而是我以文学的想象把它编织起来的；每一个小说人物也都是根据现实中的人再加以"文学地"综合变造。我希望能以小说的方式来替七十年代的台湾留下一些人性的和社会的记录。因此，这部《台北，台北!》只是我预计要写的一个三部曲的第一部而已，我希望以这个三部曲来贯串整个七十年代的台湾社会，从1971年写到1980年，详实地记录生活于此地的我所深爱的同胞们的种种爱恨、悲欢和奋斗的故事。

这部小说能够在监牢里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所有关心"高雄事件"的朋友们，如果没有大家的热心关切和声援，在漫长的牢狱生活里，我绝不可能有这么坚强的意志和平静的心情来从事写作。其次，我要感谢与我一起关在龟山

的每一位难友——纪万生、邱茂男、魏廷朝、蔡垂和、陈博文、蔡有全、余阿兴、戴振耀、张富忠、邱垂贞、陈忠信、许天贤、傅耀坤、周平德、范政佑、吴振明、杨青矗，以及刘峰松等人。他们丰富的同志爱，使我在困难中得到许多安慰和鼓励，他们也是我在狱中写作时讨论的对象和最早的读者。其中尤以蔡垂和、魏廷朝和邱茂男在不同的时间与我同住一间牢房时，对我的照顾和帮助特多，使我能更专心地写作。这些在患难中培养出来的友谊，是我一生中最珍贵、最美丽的回忆。而今，魏廷朝却因为另一个"叛乱案"未完的刑期又被关到新店的军法处，吴振明则被诬蔑为流氓，以扫黑的名义再度被关进警备总部，不久前又听说已被送去绿岛管训了。此时，我虽然身在牢外，但是，想起仍在狱中受难的朋友，我的心情是悲愤沉痛的。出狱后，我曾把这部小说的原稿交给几位好友阅读，感谢他们也都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和鼓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小说如果有任何可取之处，应该归功于前述的每一位朋友。

但是，当我在狱中所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牛肚港的故事》在国民党文工会的压力下被封杀，而不能照约定的那样在《联合文学》连载后，对于是否要让这部《台北，台北！》在此时此地出版，曾经很使我感到犹疑。因为纯粹以生意观点经营的出版商看到"牛肚港"的前车之鉴后，是绝不会来找我出版这部小说的。至于好朋友经营的出版社基于道义的支持，虽然愿意冒可能被查禁的风险来出版它，却被我婉拒了。因为我不愿意拖累好朋友，使他们蒙受金钱的损失。但是，千辛万苦写出来的作品竟不能见天日，这不仅

使我个人万分郁闷，同时也使我觉得对许许多多曾经为真理、正义而受难的朋友和前辈无法交代。因此，几经考虑后，我终于下定决心，不顾一切艰难困苦，自费把它出版了，希望能得到大家更多的关注、批评和指教。

“含泪播种，必能欢呼收割！”这是我在牢里写完这部小说时的感想，也是我在艰苦的牢狱里始终坚持的信念。横在我们眼前的道路虽然还很长很远，而且充满了荆棘。但是，只要大家一起来努力，就有信心走出一条宽广的道路。现在，我把这份感想和信念送给所有曾经为真理、正义和爱而受苦的朋友们，希望这部小说能给大家一些安慰和鼓励。

最后，我要感谢内人穗英，感谢她对我坚定不移的爱心和支持，陪我走过了那段漫长黑暗的日子。也感谢我敬爱的母亲，她生前为我操劳忧虑，对我关爱备至。但是，当我重返家园时，却再也见不到母亲的慈颜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悲伤和遗憾。愿母亲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1985年4月18日写于中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一卷

1

“嘟——嘟——”“嘟——嘟——”火车叫着，慢慢把速度减缓了。

车厢里有一些人已经从座位里站起来，一面整理衣服，一面从行李架上取下他们的手提箱和旅行袋之类的东西。人声比原先更嘈杂地从车厢的四处响了起来。

一位戴着近视眼镜的青年，颧骨高高的，下巴有点尖削，手上拿着一本卷成筒状的书，把额头靠在玻璃窗上朝外面望着。只见一排一排的楼房和高大的店招、广告牌，不断向后面倒退。在前面不很远的天空里飘着一个极大的气球，在风里摇着晃着，气球下面挂着一块长形的鲜红布幅。他不经意地向那气球望了望，只见那红布上写着几个白色的大字：“台北火车站”。他心里不禁震动了一下，赶忙把玻璃上的雾气用手擦了擦，凝足了目力，又向那气球望去。但是，火车已经稍稍转了个弯，那气球竟不见了。

“台北到了吗？这是台北了吗？”坐在他旁边那位头上包着黑丝巾，身上穿着黑旧大衣的五十几岁乡下人打扮的妇人，隔着中间走道，慌慌张张地向站起来取行李的人大声问。

“是啦，下一站就是台北了。”他回头向她说，心里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兴奋。

"啊! 那要赶紧，那要赶紧!"那妇人一听，猛地站起来，臃臃肿肿地踮起双脚，把手伸向上面的行李架。火车突然"狂空郎! 狂空郎!"地震动了几下，使她冷不防向前一冲，"哎哟!"惊叫了一声，两脚还没来得及站稳，身体已经踉踉跄跄，又向原来的椅子里倒下去了。

"啊! 怎么这样? 怎么这样? 夭寿! 要惊死人了! 我的包袱啊!"她叫着，身体猛力一挣，又站了起来。

"小心，小心，不要急啦! 火车都还没进站哩。"那年轻人好意地说，一面把书塞进夹克口袋里，一面举手略略挡住她，唯恐她一不小心会栽到他身上似的。

"哦?还没到吗?还没有到吗?"她朝外面望了望，说："我还是先把包袱拿下来较安稳，少年的，……"

"那个黑色布包是你的吗?我替你拿。"那年轻人不等她说完，就站起来替她把包袱取了下来。

"啊，多谢，多谢!"那妇人接过黑布包，一面自顾自地嘟囔着："夭寿，罕得来台北，路也不熟，差一点就坐过头了，……"一面歪歪踉踉地向车门那边走了过去。

那年轻人习惯地把眼镜向上推了推，侧转了身体望向后边的座位，朝一个骨骼粗大，皮肤黝黑，年纪和他略相仿佛的青年轻轻叫了一声："蕃薯仔!"

那人望着窗外，转头来应了一声"嗯?"同时咧开嘴巴，朝他无声地笑了笑。

"台北到了!"那戴眼镜的青年说，站直了身体，从行李架上取下一个黄褐色的老旧的皮箱、一个塑胶旅行袋和一个装着棉被的帆布袋。

他把塑胶旅行袋斜挂在身上，然后，一手夹住帆布袋，

一手提起皮箱，望着走道中间已经纷纷向车门鱼贯地拥挤过去的人群，站着等了一会儿，发现火车还没进站，便又放下棉被袋和皮箱，人也跟着坐回椅子里。

火车缓缓驶进闹区了，街上的汽车和行人都被平交道的栅栏阻住了。人们颈子上围着围巾，穿着臃肿的冬衣，僵直地站在平交道口。那只穿着三角裤，赤裸着粉红大腿，露出两只大奶子，手上握着冲锋枪的外国女电影明星的广告画，高高地挂在对街的楼顶间。一长串的汽车被红灯阻住了，两个摩托车骑士张开嘴巴，互相挥舞着手臂，不知是在吵架还是在打招呼。这一切的景象都流水似的流过他的眼底。

"花生仔*，要下车啦！"那个被叫做蕃薯仔的高大青年，不知何时已站在他面前，象一座高塔般俯视着他。

"火车还没进站，不必急啦！"他仰起头来，说："人这么挤，我们等最后下车好了。"

"不要紧，我替你拿皮箱和棉被袋，你跟在我后面好了。"蕃薯仔把自己唯一的一件行李——一个塑胶旅行袋斜背在身上，再弯身抓起花生仔的棉被袋和皮箱，硬往走道的人群里挤了过去。

花生仔在后面看见人们被蕃薯仔挤得歪歪倒倒的，脸上露出嫌厌的表情闪避着，不禁红了脸，低声说："蕃薯仔，不要挤啦，等别人走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一起走好了。"

"有什么关系？"蕃薯仔转身说："你是挤不过来吗？"

"这样不好啦，别人都被你挤得……"

"啊！我挤了别人吗？失礼，失礼！"蕃薯仔望了望旁边

---

* 在台湾称花生为"土豆"。——编者注

的人，尴尬地站在那里，再也不敢动了。他那一百九十几厘米的身高，宽肩阔背，手脚粗大，在狭窄的车厢走道和拥挤的人群当中，简直就象一座小山，把走道前后的通路都给堵住了。

“哇！那个人好高哦！”后面传来年轻妇女娇作地惊叹，“简直象山一样！”

“妈咪，你看，巨人，巨人！”一个小娃娃稚嫩地喊着。

火车突然又“狂郎！狂郎！”地震动了一下，人们身体晃了晃，发出一阵轻轻的骚动。接着，外面传来一个女播音员尖细造作的声音，把尾音拖得长长的，重复地叫着：“台北到了，台北到了，下车的旅客，请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东西！台北到了，台北到了……”

下车的人群象一片汹涌的海浪，“哗啦——！哗啦——！”地喧腾着，向前涌去。

蕃薯仔和花生仔夹在人群里，蹭蹭蹬蹬地挪到车门口，抬头一望，不禁被眼前汹涌的人潮给震住了，还来不及反应，已经被后面的人给推涌到车下，一起被卷进人潮里，霎那间，已在人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是一九七一年的二月底，农历新年才过完不久，虽然已经春天了，但是，因为来自北方的寒流的影响，最近的天气突然又变得格外寒冷了起来。

这两位来自花莲偏远乡下的年轻人，那个戴眼镜的叫陈富来，身上穿着一件簇新的深蓝色夹克和一条黑色西装裤，身材只有一百六十五厘米高，下巴尖削，脸色有点苍白，显得斯文瘦弱，但是，两只眼睛在眼镜底下却灵活地转动着。那个体格魁梧高大，皮肤黝黑的，名字叫杜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